

Max Weber

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

[德] 马克斯·韦伯 著

阎克文 姚燕 译

阎克文 校

文
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Horizon

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

[德] 马克斯·韦伯 著

阎克文 姚燕 译

阎克文 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

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

[德] 马克斯·韦伯 著

阎克文 姚燕 译

阎克文 校

出品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单 琪

营销编辑：胡珍珍

封面设计：陆智昌

美术编辑：安克晨

出品：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

出版发行：上海人民出版社

印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制版：北京百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本：820mm×1280mm 1/32

印张：10.75 字数：220,000 插页：2

2022年11月第1版 2022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75.00元

ISBN：978-7-208-17903-5/C·66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 / (德) 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著；阎克文，姚燕译. —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2022

ISBN 978-7-208-17903-5

I. ①社… II. ①马… ②阎… ③姚… III. ①社会科
学-方法论-文集 IV. ①C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2)第161242号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52187586

文
景

Horizon



本书为浙江大学暨浙大人文高等研究院资助翻译项目

目 录

导读 伴随我成长的韦伯 赵鼎新 1

译者说明 阎克文 12

社会科学认识与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 15

一 16

二 28

文化科学逻辑领域的批判研究 80

一、与爱德华·迈尔商榷 80

二、历史因果考察中的客观可能性与适当关联 126

边际效用理论与“心理物理学基本定律” 155

“能量学的”文化理论 173

正当支配的三个纯粹类型 203

社会科学与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 219

社会学基本概念 271

引言 271

一、社会学概念与社会行动的“意义” 272

二、社会行动的种类 297

三、社会关系 300

四、社会行动的类型：习惯 / 习俗 303

五、正当性秩序的概念 305

六、正当性秩序的种类：惯例与法律 309

七、正当性秩序 312

八、斗争 315

九、共同体关系与联合体关系 318

十、开放的与封闭的关系 321

十一、代表权 325

十二、集群（Verband）327

- 十三、集群 330
- 十四、行政型秩序和调整型秩序 332
- 十五、经营 333
- 十六、权力与支配 334
- 十七、政治集群与僧侣政治集群 335

导读 伴随我成长的韦伯

阎克文先生译成韦伯的重要著作《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向我索序。我并非专研韦伯思想和生平的专家，但我将自己视为另一类 Weberian，即研究社会现象时采取与韦伯相似视角并试图改进和发展韦伯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专家。我通过这篇并不能算正式导读的小文将与读者分享我对韦伯理论与方法的理解与运用，希望能为读者带来一定启迪。

我对韦伯的认识过程大致可以分三个阶段：1980年代初遇韦伯；1990年代初再遇韦伯；此后几十年的改造和发展韦伯。以下我按照时间顺序，就韦伯在方法论方面对我的重要影响做个分享。

初遇韦伯

80年代初，我买了“走向未来丛书”中的不少本，其中有一本是节选编译版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韦伯。当时，我对书中所讲的一切似懂非懂，同时，我也并不认为韦伯在经验层

面对于资本主义形成的解释有道理。不过，我那时正逐步脱离以五阶段论为核心的机械历史唯物主义，因此该书的观点促使我开始思考宗教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以及文化 / 意识形态是否具有独立于经济基础的力量等问题。我那时候的理解是：某一宗教初期的教义和组织形式肯定与它所处时代的经济基础有很大关联，但是某宗教的教义和组织形态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一种结构，即使经济基础时过境迁，这些结构性因素仍然会发挥着作用。当然，我那时的理解是有误的，因为一个新兴宗教的教义和组织形式背后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彼时彼地的经济环境，而且还有该新兴宗教所处的政治、地缘政治与文化等环境。

再遇韦伯

1990年我改行研究社会学后，再次通读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但我依然不认可此书在经验层面对资本主义形成的解释。我同时还读了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以下简称《中国的宗教》）和其他不少著述。当时我的一个疑问是：《中国的宗教》的许多经验论述错误百出，今天看这样一本书意义到底有多大？然而，种种原因改变了我的看法。

我从昆虫学刚转行读社会学时不少人开玩笑式地问我：“你先前研究六条腿的昆虫，现在对两条腿的人类感兴趣了。你能否给我们讲一下，这两类动物到底有什么异同？”这个看似简单，其实却很本质的问题让我思考良久。我比较成型的回答是：将人类与昆虫做类比意义不大，但将人与演化谱系上与人类接近的黑猩猩做类比则有很大的启发性。人与黑猩猩有许多相似——人是地域性动物，会保卫自己的领地，

黑猩猩也是；人是经济动物，会利用工具和进行交换，黑猩猩在这方面也表现出一定能力；人是政治动物，会运用各种方式在自己的群体中取得优势地位，黑猩猩也相似。与黑猩猩相比，人类只有一个独特之处，那就是有强大的概念形成和逻辑思维能力，以及论证自我生命意义和行为正确性的能力，而黑猩猩则基本没有。顺着这思路，我豁然开朗：虽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国的宗教》《印度的宗教》《古犹太教》等著作中或许存在经验层面的错误，但是在方法论方面，韦伯其实是在说人类是有很强大的自我论证能力的动物，因此文化 / 意识形态行为也是人的一个特性，而韦伯的这些著作正是在分析人类的文化 / 意识形态本性如何与人类从灵长目动物那里获得的地域 / 政治性和经济性在不同的时空下产生各种复杂的交互作用，并且在人类历史的一些关键节点上形塑了世界各文明的不同发展形态。

迈入社会学领域后，我看了大量当代学者就中国的宗教、政治、城市等议题展开的研究和讨论。在阅读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虽然韦伯的《中国的宗教》在经验层面上有大量错误，由于他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比较视角，因此韦伯对中国历史大方向的把握以及他的总体结论，不但要比绝大多数当代学者更加到位，而且更具穿透力。这个感受加深了我对经验事实的掌握和大方向的把握之间微妙关系的理解，让我进一步审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中国的宗教》等著作的意义。正是在这基础上，我批判了“加州学派”的观点，提出了一个基于韦伯思想，但是同时又扬弃了韦伯的具体论点中对工业资本主义在西方兴起原因的解释。这个解释在我的 *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新论》，以下简称《儒法国家》，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2 年 6 月出版）一书中都有呈现。

发展韦伯

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一直试图在方法论上与韦伯对话，并希望能在有些方面超越韦伯。下面列举两个我发展和改造韦伯理论的例子。

第一，对韦伯支配理论的改造。改行社会学后，我系统阅读了三方面的文献，即后发展国家经济发展理论、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并且在历史脉络下考察西方多党民主的发展以及“第三次民主浪潮”的历史意义。现在我和大家分享我在思考第三次民主浪潮的历史意义过程中如何学习和改造了韦伯。

在看了大量与当代民主的诞生和发展的有关文献后，我得出如下结论：所谓的第三次民主浪潮并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美国在世界上取得独霸的后果。与苏联输出革命相同，这次输出民主也会反过来累及美国，并导致自由主义思潮在世界上的衰弱。

正因为我没有把西方民主制度看作历史必然，我在20世纪90年代就能意识到近几十年来西方政治学家在民主/专制体制两分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种理论，包括民主转型理论和公民社会理论问题很大。也正是在这一考虑下，我在1990年代初就开始从韦伯的权力支配视角对当代中国政治展开了分析。我的研究涉及很广，包括经济发展、公共舆论、社会运动等。我的研究成果合集《合法性的政治》2017年在台大出版中心发表。在这些著述中，我对韦伯的支配理论作了一些修改。

韦伯认为支配有三种理想类型基础：传统、卡理斯玛与法律/理性。而我强调国家政权有三种理想类型的确立合法性的渠道：意识形态、程序与绩效。这里的意识形态大致对应韦伯的传统和卡理斯玛权

威，程序大致对应于韦伯的法律 / 理性权威。我和韦伯的最大区别是增加了绩效合法性。促使我做出此选择的原因有四。一是韦伯讲的主要是更一般性支配关系的合法性来源，而我则着眼于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对于国家来说，提供公共物是其存在的最主要的基础，也就是说国家必须具备绩效合法性。二是我所讲的是一个国家执政基础问题，内涵其实要比从法的角度出发的“合法性”要大一些。三是中国自古就讲“天命”，而天命的一个主要基础就是国家提供公共物的能力，即绩效。四是韦伯的支配理论与他自己对个体层面的理性分类（目的理性、价值理性和理论 / 形式理性）对不上。在我的分类体系中，绩效合法性对应于目的理性，即绩效合法性在一个国家统治中的地位越重要，目的理性在该国民众的政治思维和行为模式中也就越占据重要地位；意识形态合法性对应于价值理性，即意识形态合法性在一个国家统治中的地位越重要，价值理性在该国民众的政治思维和行为模式中也就越占据重要地位；程序合法性对应于理论 / 形式理性，即程序合法性在一个国家统治中的地位越重要，形式理性在该国民众的政治思维和行为模式中也就越占据重要地位。显然，我的分类提升了理论的宏微观对称性。

第二，发展了韦伯的理想类型方法。为了追求价值中立，韦伯开拓了差异性现象发问和理想类型方法。就差异性现象进行发问目前已成为社会科学中较为普遍的发问方式，我也做了不少这方面的探索。与之相比，理想类型方法的发展却相对薄弱。人类的行为十分驳杂：人既能论证自己的行动，也会言行不一；人经常会明明做了错事还理直气壮；人在许多场合下动机也不单纯。因此，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社会行动者、组织或制度，比如国家、阶级、封建制度、官僚制或民主

制，都会因为人类在个体和组织层面上的行为和目的驳杂性而形成多种形式。这就意味着，采用源自特定时空的概念，去理解在不同时空发生的看似相似的事件，其实总会带有不同程度的偏差。社会科学概念的这一特性给分析带来许多困难。特别是，如果从日常性概念而不是从理想类型概念角度来分析社会现象，我们往往会把一个内部有着高度多样性的行动者（比如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学生、女性，等等）认定为是具有相同性质和利益的行动者，把给定时空下的特殊规律当作普遍规律，把性质完全不同的社会机制和逻辑混淆在一起，把自我偏好大规模地带入分析和结论当中。韦伯的理想类型方法想处理的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对于韦伯来说，理想类型就是通过对具体经验事物的观察而建构起来的一种毫不含糊的、精确且完全抽象的不存在之物，但是它却可以帮助我们来更好地把握模糊、易变和难以捉摸的具体现实。

理想类型方法可以说是韦伯所创造的最为重要的社会科学方法之一，但是这方法却没有在韦伯生前以及去世之后有很好的发展。至今为止，大多数社会学家都停留在把理想类型概念仅仅作为一种解读工具。

我对理想类型方法做了两个方面的修改。其一是受到与韦伯同时代的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所提倡的公理化运动启发，把理想类型扩展为理想类型空间，或者说“理想类型集”，即每个理想类型维度不但相互完全独立，并且还能被理解为具有某种不证自明的公理性，而它们加在一起则构成了一个能覆盖某个大类的社会学议题所有可能性的“空间”。前面所提到的国家合法性的三个基础以及人类理性的三个基础，都是理想类型集的具体例子。我在《儒法国家》中

提出的历史变迁理论，即在经济、政治、军事、意识形态四个理想类型层面的竞争和制度化所产生的各种可以通过推理所获得的机制性关系，构成了人类历史变迁的根本动力，则是基于理想类型集方法的另外一个例子。

二是借用了笛卡尔的解析几何方法。解析几何对数学的发展起有关键作用。笛卡尔后的许多哲学家，比如斯宾诺莎（Spinoza）、约翰·德威特（Johan De Witt）、孔德（Auguste Comte）等，都想借用此方法来分析社会现象，但都不得要领。我的策略是把理想类型集看作为一个N维欧几里得空间，而理想类型的建构就好比是自然科学中控制实验的设计。所不同的是，自然科学控制实验的目的则在于通过实证来归纳出在控制条件下能成立的自然法则，社会科学建立理想类型集的目的则在于通过演绎来寻找出各种在理想条件下所能成立的社会机制。比如，我把绩效、意识形态和程序合法性看作是一个三维欧几里得空间，并且建立了诸如“绩效合法性在一个国家统治中的地位越重要，目的理性在该国民众的政治思维和行为模式中也就越占据重要地位”这样的因果机制。还比如，在建立我的历史变迁理论时，我把人类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军事四个特性看作是一个四维欧几里得空间，并对人类在这四个理想类型维度所展开的竞争和冲突的机制性规律作出解析，建立了诸如“经济竞争在一个社会中越重要，以私人利益为导向的目的理性在该社会中的位置也会越重要”这样的因果机制。我的这些推理主要见于《儒法国家》的第一章。

一旦建立了理想类型集，我们就可以通过演绎来对该理想类型集的每个维度所隐含的社会学机制作出解析，或者说通过演绎来确定每个坐标的多重特殊性质。具体到我的历史变迁理论，它的一个主要用